

一套“可信”又“可爱”的社会经济史著作 ——“黄宗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表作两种”评介

和永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揆诸人文社科的学术成果，做到“可信”就已非常之难；要想在“可信”之上做到“可爱”，则更是难上加难。文章认为黄宗智先生所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称得上是一套“可信”又“可爱”的社会经济史著作。

一

在谈这套书是如何“可信”“可爱”之前，我们需要对两书分别略作介绍。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是黄宗智先生进入不惑之年后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该书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试图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设”（《中文版序》，第2页）。在资料选择上，作者采用了革命前中国农村最系统和细致的调查资料——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的“社会和经济人类学”调查资料，并辅之以清代“刑科题本”、地方志、农书等历史文献资料。在理论运用上，作者有意识地同时借鉴当时影响最大的三大理论传统，即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质主义理论。此书英文版出版于1985年，并于是年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史景迁、罗威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学者先后撰文评介此书。史景迁写道：“我认为，这是迄今关于华北农村最好的研究著作。”罗威廉认为：“这本书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不仅达到了迄今未见的深度，而且还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是黄宗智先生继《华北》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著作。该书基本沿着《华北》的研究进路，再次使用翔实的“满铁”微观调查资料，并辅之各种历史文献及作者自己连续数年的实地追踪调查，对待理论的态度亦与《华北》一致。比较两书，《长江》与《华北》的不同点主要有二：一、《长江》的后半部分将此地区的乡

村社会经济史一直追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1980 年代（这点看两书英文书名可一目了然：《华北》的英文书名是“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长江》的英文书名是“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二，因前有《华北》，《长江》在讨论本地区乡村社会经济的特点及其演变逻辑时与华北地区多有比较。《长江》英文版出版于 1990 年，并于 1992 年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周锡瑞、怀默霆等著名学者对此书推崇有加。周锡瑞所撰“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颁奖词写道：“黄宗智清晰地表明，他的这种跨越 1949 年分界的研究，能够带来丰富的成果；这种研究既澄清了之前的历史，又照亮了现代。”怀默霆认为：“从今以后，与研究中国乡村历史的学者一样，研究现代中国农业体系的学者也必须直面黄宗智的研究和见解。”

《华北》和《长江》中文版，由中华书局于 1986 年和 1992 年分别出版，之后两书一再重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新版在充分吸收之前各版所长、增加作者修订外精心编校设计，最终以“黄宗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表作两种”的套书形式面向读者，相信必能受到大家的欢迎。

二

下面谈谈这套书如何“可信”。

我认为黄宗智先生这两本书的“可信”，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待理论的开放态度，二是强调充分占有感性的经验材料。

先说对待理论的开放态度。黄宗智先生对不同理论的开放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重视理论，但不迷信理论。这点我们可以以《华北》《长江》两书对小农特点的概括为例来说明。

历史上，对小农的面貌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小农类似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小农是租税的交纳者，是阶级关系中受剥削的耕作者，其生产的剩余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生存；以苏联恰亚诺夫学派为代表的实质主义理论认为：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

单一起来看，这三种对小农特点的认识，其背后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撑。但综合来看，单取三种理论中的任一种，无视其他两种理论，都必然看不到小农的另外两种面貌。正因为如此，黄宗智先生在《华北》《长江》中采用的是一个综合的分析。他指出：以上三种对小农特点的认识，对我们了解他们所特别强调的那个方面是有帮助的。可是，这些分析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继续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黄宗智先生主张：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耕作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

可以说，这种对待不同理论的开放态度，使黄宗智先生能看到不同理论的长处，择其善者；同时又能看到其不足，随时准备修正，而非一味迷信。正是这种对待不同理论的开放态度，为他在《华北》和《长江》中做出“可信”的分析并得出“可信”的结论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说黄宗智先生如何强调充分占有感性的经验材料。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新版合序中》（以下简称《新版合序》）中，黄宗智先生指出他这两本专著与之前学术成果的不同首先在于经验层面的依据。《华北》所用经验材料主要包括：“满铁”调查资料、清代“刑科题本”命案档案、顺天府宝坻县地方政府档案，以及黄先生在顺义县沙井村（“满铁”曾非常系统详尽调查过的村庄之一）实地调查所得资料；《长江》所用经验材料包括：“满铁”调查资料、地方志、官私档案，以及黄先生在1983、1984、1985、1988年四次深入松江县华阳桥四个村（也是“满铁”曾集中调查过的村庄）所得资料。如此丰富的经验材料，为《华北》《长江》提供了以往研究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详细资料。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在黄宗智先生这两本书中看到众多深入到一个一个自然村，甚至是一家一户和个人的详细材料。关于收集经验材料，黄宗智先生在《华北》中有几句经验之谈，我想引述如下：

中国学者常把查阅这类档案的工作比作“海底捞针”；我自己则比较喜欢用钓鱼作比喻——刹那的兴奋与长时的无声无息并存。这是一件经常只有微小收获的艰苦工作。（《华北》，第55页）

综上，正是这种对待不同理论的开放态度，以及强调充分占有感性的经验材料，使黄宗智先生的《华北》《长江》避免了其师萧公权先生所批评的许多海外中国研究所犯的错误——“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中国小农的生活画卷。

三

接着谈谈这套书如何“可爱”。

我认为黄宗智先生这套书的“可爱”，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弱者的关怀，二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注。

先说对弱者的关怀。黄宗智先生曾在一篇自述文章《感情，是我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中说：“自己在价值观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认作人生和学术的最高目的和价值。”“由于一种几乎是天生的，也是由于对母亲的感情驱动，要求自己更多地关心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人民。”在黄先生的《华北》《长江》中有许多对弱者充满同情的话：“我们可以说：鼻子快被水淹没的人，会用尽一切方法，以求冒出水面。”（《华北》，第219页）“贫农确实犹如一个处身于水深没颈的人，即使是一阵轻波细浪，也可能把他淹没。”（《华北》，第340页）黄先生这样描述一个“完全无产化了的长工”的命运：

一个完全无产化了的长工，他的工资，在自己膳食之外，只够用于一个成男的口粮，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假如妇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样当长工或从事雇佣劳动，这些长工也许可以娶妻生子而再生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停滞的经济中的大量过剩劳动，排除了这种妇女就业的可能性。结果一个完全“无产化”了的雇农，一般只可能是光棍一个，而成为他家最终的一代。（《华北》，第230—231页）

类似这样读之令人鼻酸的描述在《华北》《长江》中还有很多，黄宗智先生以学术的方式对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农的困境做了深刻揭示，其冷峻的笔调背后是何等的悲天悯人！

说完对弱者的关怀，我们再看黄宗智先生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注。

在自述文章《感情，是我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以及《新版合序》中，黄宗智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履历做了简短回顾。黄先生写道：“正是中西之间的张力促使我在写完博士论文并将其修改补充成为第一本专著之后，开始系统地研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同时关心两者，除了作为学术问题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感情因素：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作为一位早期（1911年）庚子赔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的经济学博士——代表的是美国，也是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而母亲——作为一位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代表的则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农村。”可以说，这种非常个人化的背景是黄宗智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深层动力。

具体到《华北》《长江》两书，黄宗智先生这两本书所要回答的共同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黄先生的著作告诉我们：人口压力与小农家庭的特征（生产与消费合一，无法辞退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户劳动力的密集投入与农业“内卷化”（“内卷化”指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对应的是家庭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甚至低于满足一个劳动力基本生存的口粮水平），这种农业“内卷化”造成的“没有增长的发展”，扼杀了中国实现类似资本主义式的更高水平发展的可能。“内卷”是黄先生“发明”的中文关键词，用以描述中国小农经济的突出特点。时至今日，“内卷”已成功“出圈”，经常被人挂在嘴边。正如黄先生在《新版合序》长脚注中所说：“众所周知，最近几年‘内卷’一词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词，并且被用于几乎任何超额的劳动密集投入，如‘996’的工作日程，应试教育体系，甚至官僚体系运作等。它显然触发了许多人的深层共鸣，突出了人多机会少、资源少的中国基本国情。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广大民众在那样的环境下的焦虑心态。”

联系当下，我们必须承认黄宗智先生说的“人多机会少、资源少的中国基本国情”确属实情。对比明清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漫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实现了“农业外就业”。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近几年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人多机会少、资源少的中国基本国情”势必进一步凸显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时刻，重温黄先生的《华北》《长江》两书，相信对一般读者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对执政者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以改善民生，都会大有裨益。

结语

《孟子·万章下》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最后我想简短介绍一个编书过程中与黄宗智先生交往的小插曲以结束这篇小文。

编辑《华北》《长江》的过程中，我多次与黄宗智先生通过邮件沟通。因两书图表较多，黄先生特意提醒我们注意这部分的校对，他说：“我想确认一下，两书表都比较多，您校阅时，是否每一个表都同样仔细校对了？还是只集中仔细校阅了一部分？想来要同样仔细校阅每一个表，工程较大，因此才觉得需要啰嗦地向您确认一下。”在黄先生的提醒下，我通过对比中华书局版、法律出版社版和新版文件，对两书图表逐行逐字做了几遍校核，发现了好些存在出入的地方。后将这些问题反馈黄先生，经他确认，好些确属旧版错误。黄先生确认后来邮件说：“难得您找出了两书表格的这些错误，非常感谢。这些都是重要的纠正。”不仅如此，他还几次提醒务必在《新版合序》长脚注最后加这样一句话：“另外，本版校阅较细，纠正了一些之前版本中出现的笔误。”

以上虽是小事，但我觉得颇能表现黄宗智先生本人“求真（可信）”和“可爱”的一面，故附记于此。